

朱 提 文 化

朱提文化是昭通

地区古代各族人民辛

勤拓荒，用血与汗、

铁与火铸就的灿烂文

化，涵盖着多元的民

族文化。朱提青铜文

化繁荣一时；朱提

银名噪千古，闻名于

当时后世；孟孝琚

碑、霍承嗣墓壁画先

后辉映，誉为宁州冠

冕。它与滇文化、洱

海文化堪称为云南历

史文化的代表。



研 究 论 丛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昭通地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朱 提 文 化



研 究 论 丛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昭通地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提文化研究论丛/昭通地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6

ISBN 7-5367-1827-6

I. 朱… II. 昭… III. 文化-研究-云南-昭通-文集
IV. G127.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1365 号

责任编辑: 董 艾

责任校对: 晋存真

装帧设计: 杨弼睿

*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

云南文化激光照排公司排版

云南省农垦印刷包装厂印装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5.125 字数: 390 千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30.00 元

本书选择收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研究昭通社会、经济、文化、民族的有代表性的专题论文三十四篇，这些论文皆是有较高学术价值，有一定深度和力度的研究成果。论文从不同的角度、侧面，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了昭通的历史面貌。对朱提文化、千顷池文化提出了不同观点，进行争鸣，对改土归流、清代咸同时期的苗族及各族起义作了论述，充分地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朱提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也反映了文才辈出的新气象和大好局面。

编 委 会

主 任	朱恩铸		
副主任	曾令云	傅永祥	
委 员	张友炎	陈本明	吉筱林
主 编	陈本明		
编 辑	傅永祥	吉筱林	

序

当《朱提文化研究论丛》与读者见面时，已是1999年，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再过几个月，人类就将迈入新世纪。这部书出版在世纪之交、千年转折的时候。我们谨以这部论文集，献给21世纪、献给21世纪的昭通人民。

昭通地处滇、川、黔结合部，虽然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却是人类栖息较早、开发较早的一方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其丰富的历史资源，值得我们去开发、去研究。《朱提文化研究论丛》汇集的33篇论文，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区内外学者对昭通历史研究的成果，大体反映了从战国至清代昭通的历史概况。各篇论文从不同的视角，集中研究昭通历史上的重大问题重要事件，立意高远，言之有据，论述深刻，多有新意。这是作者们多年来潜心研究的结晶。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古代哲人王夫之云：“述往以为来者师。”确实，重视历史经验的研究，时常披览前踪，引为镜鉴，有利于继往开来，有利于提高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有利于洞察一个地方的特点，以提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水平。我们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昭通的区情，就当熟谙昭通的历史；我们要把握好昭通的现实，争取辉煌的未来，也当熟谙昭通的历史。故曰：悦史者方为清醒成熟之领导者。闲翻昭通史籍，我不禁惊奇地发现：前两个千年相交之时，都是昭通走向繁荣的转折时期。而现在的昭通，经历着更大的历史转折。这给我们的头脑拓展了极大的思维空间。

公元纪元前后，是昭通开发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汉武帝在滇、川、黔结合部设犍为郡，派中郎将唐蒙倾巴蜀之力修筑西南夷道（亦称犍道），直指牂牁江（北盘江），长二千余里。正是由于这条“南方丝绸之路”的开筑，使昭通一通百通，走上历史上的繁荣之路。随着设郡与通路，大量汉民涌进昭通，屯田军旅，开矿经商，使昭通的发展产生了飞跃。公元1~5年（汉平帝元始一至五年），犍为南部都尉文齐率众“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在这个时期，先辈们兴修水利，引进水稻，开采冶炼铜、银，同时繁荣文化，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朱提文化”，“朱提银”因其纯度高、产量大而成为贡银和特殊通用货币。而当代出土的铜洗，如1935年和1965年在昭通市出土的两洗，底部均铸双鱼图案，篆书铭文分别为“建初八年（公元83年）朱提造作”和“建初元年（公元76年）堂狼造”，工艺十分精美。朱提堂狼洗的出土地远达吉林省，足可窥见当年昭通工业、商业发展水平之一斑。至于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的孟孝琚碑，被称为“滇中第一石，海内第一石”，更是罕见的文化瑰宝，展示了当时昭通的文化繁荣。

在公元纪元后第一个千年之交时，正是北宋、太宗、真宗、仁宗时期。尽管“宋挥玉斧”，太宗称大渡河以南为“此外非吾有也”，但宋王朝却一直密切注视着昭通。乌蛮族仲牟由后裔阿统于唐时迁朱提一带居住，至11世孙名乌蒙，约北宋仁宗时，势力日强，以其名其地，称朱提为乌蒙部。乌蒙归宋，宋王朝封乌蛮后裔阿杓为乌蒙王。在此期间，先辈们充分利用昭通成为中原与西南之间缓冲地带的机遇，治好了汉晋时期因开采冶炼造成的生态创伤，不仅有了较为成熟的山地畜牧文明，而且山地农业和商业也有了较大发展，使昭通的社会经济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而今，我们又经历着又一个千年之交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更巨大、更深刻。纵观两千年的沧桑史，昭通曾经辉煌过、

繁荣过，但由于诸多历史因素，现实的昭通却贫穷落后了。在这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历史转折中，我似乎看到了昭通正在崛起，昭通的再度繁荣正渐现曦微。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边远、民族地区扶持开发的力度。10月6日，朱镕基总理视察云南，首先到达昭通。朱总理为昭通提出了“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各方支持，共同富裕”的战略方针，并决定了事关昭通发展全局的一大批重点工程项目。1998年，总理对昭通的扶贫攻坚又两次批示，充满了关心、支持和希望。现在，四川内江至昆明的内昆铁路已全线开工，昆明至水富县的公路正在紧张地改造，渔洞水库继大坝完工蓄水后，灌渠正在顺利施工。多项扶贫工程逐步见到成效。通讯的大发展、因特网的联通，使昭通正在改变信息闭塞的状况。昭通似乎成了大工地，到处欣欣向荣，龙腾虎跃，一扫往昔“万马齐喑”的沉闷。昭通正发生着脱胎换骨的巨变，昭通大有希望。在21世纪，昭通一定会复苏，会振奋，会站立起来，一定会摆脱贫穷落后，再度繁荣辉煌。

面对这伟大的历史转折，面对这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们只能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要能把机遇变为现实，我们就得更深刻地认识昭通，就得扩大开放，就得艰苦奋斗、励精图治。我们编纂这部论文集，对于区内的领导者，希望他们读后“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从历史中悟出一点昭通兴衰的规律，头脑更清醒，决策更科学正确；对于昭通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可使他们更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激发他们建设家乡的高昂斗志；而对于区外、省外乃至国外，我们乃期望人们能通过这部书了解这方值得人们重视的土地，使昭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昭通。

是为序

朱恩铸

1998年11月8日

目 录

朱提文化论	潘先林 (1)
昭通经济开发简史	曹吟葵 (18)
庄跻入滇途经昭通说	李正清 (78)
秦汉时的昭通	陈孝宁 (87)
汉、晋时期“朱提文化”的轨迹	李正清 (108)
朱提经济文化盛衰考说	陈本明 (126)
历史时期中千顷池文化区域在西南及国家 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暨作用	徐 波 (142)
滇东北千顷池文化初论	王文光 (168)
千顷池文化界定诸问题研究	徐 波 (184)
论千顷池文化之经济特质	徐 波 (201)
“千顷池”商榷	陈孝宁 (215)
千顷池文化解疑 ——答陈孝宁先生	徐 波 (227)
朱提银锡白金和朱提银	张正明 (247)
再谈朱提银锡白金和朱提银	陈本明 (253)
朱提——白银	张 宁 (263)
灿烂的朱提青铜文化	陈孝宁 (266)
从通借关系看“朱提”与“寔地”	刘顺良 (282)
《孟孝琚碑》浅探	陈孝宁 (284)
关于“夜郎竹王”问题的探讨	张 宁 (295)
古夜郎国与昭通地区	刘顺良 (304)

汉晋朱提大姓史事	蒙 琰 (311)
古道探幽	刘顺才 (319)
关于诸葛亮南征经过朱提问题的探讨	陈序德 (331)
三国时期的朱提 (昭通)	范文钟 (340)
昭通东晋壁画墓主人考	胡振东 (351)
昭通东晋壁画墓述要	谢饮润 (359)
明代川滇黔之交彝族土官制度窥影	陈本明 (368)
滇东北《芒部土府陇氏族谱序》注	李正清 (376)
清初滇东北地区的改土归流	陈孝宁 (389)
清初对金沙江下游的开浚	刘顺才 (430)
关于苗族迁入昭通地区时间问题的探讨	张 宁 (447)
唐友耕其人其事	陈本明 (465)
猪拱箐陶新春苗民起义	陈本明 (469)
编后记	(475)

朱提文化论

潘先林

汉晋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大批汉族移民沿“五尺道”交通线进入云南，营邑立城，垦殖生产，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推动了滇东北朱提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故《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朱提郡：“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朱提地区超越滇池区域，成为云南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

本文拟就汉晋朱提地区文化的发展、特征、断裂及名称等问题略作概述，敬请专家读者教正。

一、朱提文化的发展

朱提，县名。《汉书·地理志》注：“朱音铄。提音时，北方人名匕曰匙。”提又作“提”、“緹”，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说：“盖本少数民族语言之译音，故无定字。”其地在今昭通，有朱提山。《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朱提郡：“本犍为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属县四。建武后省为犍为属国（东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邓方为都尉，先主因易名太守。属县五，户八千。”两晋南朝因之，其范围大体上相当于今昭通地区，包括邻近的东川、会泽、宣威及黔西北的威宁、毕节、水城等地。

朱提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孕育时期。

今昭通地区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地当交通孔道，自古就是中原地区通往云南的必经之地。还在秦汉开“西南夷”以前，朱提地区就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原始文化。

1982年11月，在昭通城北约15公里处的过山洞内发掘出一枚人类牙齿化石。经鉴定，此化石有接近于猿人的原始特征，又具有接近于现代人的进步特征，但其性质总的较晚期智人——新人具明显的原始性，似乎接近于早期智人——古人，被命名为“昭通人”。昭通人上承较早的元谋猿人，下接西畴人、丽江人、昆明人等晚期智人，填补了二者之间的空白，增强了云南地区人类发展的连续性。^①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在今天的昭鲁坝子上，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初始的人类文化。

新石器文化滇东北自成类型，目前已经发现遗址多处，以昭通闸心场和鲁甸马厂遗址为代表。闸心场遗址位于昭通城北12公里处，出土石器4件，其中梯形和长条形镞各1件，残斧1件，扁圆形石器1件，磨制极精，为它处所未见。出土陶片300多块，以泥质橙黄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陶器有2件完整，一为平底侈口罐，一为单耳细颈小瓶。纹饰简单，有平行画纹、圆点纹和粗弦纹，施于器物口沿或肩部。^②鲁甸马厂遗址位于一个小山丘上，出土梯形、长条形有段石镞及新月形、长条形石刀，其中的有段石镞非常罕见。出土陶片500余件，以泥质灰陶居多，夹砂灰陶次之，泥质黑陶极少。陶器有碗、单耳小罐、平底罐、勺形器共9件，手制，但造型圆整，似已使用转盘。另有3件灰胎黑陶打磨极光，为它处所无。^③

滇东北新石器文化以单耳细颈小瓶和有段石镞为主要特征。方国瑜先生认为其石器“与滇池、雅安所见相似。……年代应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前”^④。该文化的主人应与战国初年沿岷江迁入滇东北的僰人有关。^⑤李昆声认为其磨制极精的黑陶器似与

著名的龙山文化有一定关系。^⑥汪宁生认为马厂遗址出土的勺形器“与今少数民族的葫芦勺全同”^⑦。可见，滇东北新石器文化除具有自身的特点外，还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中原、巴蜀、滇池、夜郎等文化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复合型文化的特征。

公元前 8 世纪左右的春秋初期，蜀族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蜀国，它和公元前 8 世纪末叶巴族在川东建立的巴国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巴蜀文化。该文化圈的辐射范围包括整个朱提地区。据《蜀王本纪》载：最早的蜀王杜宇生在朱提，其妻梁氏女利也是朱提人，这表明朱提地区早在春秋初期就与川西成都平原发生了联系。到保子帝时（杜宇后三世），攻青衣，雄长僚獋，更将其纳入了蜀国的统治范围，促进了朱提地区文化的发展。《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教民务农”，则朱提已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农业生产。又据最新方法发现，商代妇好墓部分青铜器的矿料来自云南某地，“证明在 3200 年前云南的铜矿资源就已经被开发利用了”^⑧。从地理位置和交通方面考虑，这个“某地”极有可能指后来云南开采时间最长的东川铜矿（即朱提郡属的堂狼）。另外，公元前 4 世纪以前开通“蜀身毒道”后，商人往返于途，进行民间贸易往来，给朱提地区带来了各种文化的影响。此时，朱提地区的民族是獋人。《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蜀国饶“獋僮之富”，当指从川南和朱提地区掠夺獋人的奴隶买卖非常盛行。獋人，《水经·江水》引《地理风俗记》说：“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属羌之别种，原来居住在黄河上游，春秋时迁到今四川雅安地区。蜀保子帝时迫于压力沿岷江流域迁往今川南及滇东北。以獋道（今四川宜宾）为中心建立了“獋侯国”。秦汉朱提地区称为“西獋部”，有君长。他们是西南地区最为先进的民族，在朱提创造了较为先进的文化。

第二，繁荣时期。

公元前 316 年，秦遣司马错发兵攻灭巴、蜀，置巴郡、蜀

郡，移秦民万家实之，以其为基地经营西南地区。秦统一六国后，在西南地区通道、设郡、置吏。《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頡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五尺道是从今四川宜宾经昭通达曲靖的一条重要交通线，长千余里，由于工程艰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一支由内地征调来的民工长期在此施工，成为移入朱提地区的汉族人口。西汉王朝继续经营西南夷，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军进入川南和“西僰”部族区，以其地置犍为郡。其中朱提（今昭通市）、堂狼（今东川、会泽、巧家）、南广（今镇雄）、汉阳（今贵州威宁、水城）、郁郅（今宣威）5县在今滇东北和黔西北。与此同时，汉王朝又发巴、蜀、广汉卒数万人修筑自僰道至牂牁江（今南盘江）的“南夷道”。《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唐蒙略通夜郎、西僰时，“（蜀）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转漕”就是运输民工。后因巴、蜀租赋不足，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⑨加上征发从军的“三辅罪人”、“京师亡命”及往返于滇蜀间的商贾，大批汉族移居朱提地区，形成相对集中的汉族移民区，汉文化在五尺道交通沿线植根下来，朱提地区成为汉王朝势力和汉文化进入云南的前哨阵地。就在这一时期，随着“滇”国的灭亡，以滇池为中心的滇文化发生断裂，云南文化的中心开始东移。到了东汉，中央王朝的势力进一步深入，设置了犍为属国都尉统治，有汉户7938，口37187。^⑩社会经济高度繁荣，甚至出现了某些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朱提地区取代滇池成为云南文化发展的中心。

1. 水稻种植与开凿龙池。朱提地区是汉代移民屯田的重要地区，他们将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五尺道”交通沿线。《华阳国志·南中志》朱提郡说：“先有梓潼文齐，初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同书卷十《文齐传》载文齐孝平帝末（公元1~5年）为犍为属国，则在东汉初年（按：此时尚

未设犍为属国，当是犍为南部之误）。文齐在东汉初年率领汉族移民穿渠引水溉田，推广了内地的水稻种植和灌溉技术。龙池，左思《蜀都赋》谓：“龙池湍瀑渍其隈”，刘逵注曰：“龙池，在朱提南十里（《续汉书·郡国志》注引作‘数十里’），地周四十七里。”后人推测为近代昭通鲁甸之间的八仙海，今已成平陆。又有千顷池，魏完《南中志》说：“（朱提）具有大渊池水，名千顷池。”《永昌郡传》也载：“朱提郡……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夔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则千顷池别为一池，与龙池有别，其地据方国瑜先生考证，认为昭通府“南有小长海，水名千顷池”^①。是时，朱提地区有两池溉田，其中龙池得到了开凿整修，表明当时的昭鲁坝子上水稻种植非常普遍，与此相应必须形成和内地不相上下的灌溉技术及稻作文化因素。另外，昭通、鲁甸“梁堆”汉墓中还出土了大批青铜和铁器生产工具，其铁器基本和内地铁农具相同。墓葬封土中还发现过上铸“蜀郡”、“千万”或“蜀郡”、“成都”字样的铁口锄，是东汉以前由四川传入的。^②且出土的明器中有水田、池塘等，^③反映了汉代朱提地区农业生产的高超技术及其与内地的联系。

2. 灿烂的青铜文化。《续汉书·郡国志》说：“朱提，山出银、铜。”由于朱提地区的铜矿开采较早，到东汉时期，本区已成为全国青铜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产品以传世朱提、堂狼洗最为著名。洗是一种盛水之器，早在先秦时期即已使用，到东汉时因产于朱提、堂狼两地而得名，其收藏遍及南北。近世昭通“梁堆”墓中多有出土。据有关专家统计，作于朱提、堂狼之器，有地名可考的共 50 多件。其余未著地名而可知是朱提、堂狼造的，仅容庚《汉金文录》所著录，亦 20 余器，数量不少。^④朱提、堂狼铜洗上的纹饰多采用双鱼纹和鱼鹭纹，以“富贵有余”、“吉庆有余”之谐音象征吉祥富贵。其款识多为纪年及产地，少数间以吉祥语。有的末尾附有“工”或“牢工”等字样，有学者据此推

测东汉朱提地区青铜制造业属“工官”所有，更有以为有工场手工业存在。^⑮对此前人已作考校，认为东汉朱提地区青铜制造业尚掌握在私人（大姓）手中，此二字是夸耀器物精工坚固之意。^⑯传世朱提、堂狼铜洗上的纪年始于东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止于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表明这一个是世纪的时间是朱提青铜文化鼎盛发展的时期。《南齐书·刘峻传》言蒙城（今昭通）“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可见其规模之大。朱提地区的青铜器工艺精巧，按一定规格为市场成批生产，闻名全国，受同期蜀郡洗制造技术的影响而又可与之媲美，这与汉代朱提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分不开的。

东汉以后，朱提地区在冶金方面又有一个伟大的创造，那就是白铜的发明。《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堂狼县，……出银铅白铜”；李时珍《本草纲目》卷8说：“白铜出云南”；17至18世纪欧洲的书籍中也说白铜出云南，经广州出口，有的则直称“云南白铜”。^⑰白铜是铜镍合金，我国当在公元3世纪以前就发现了镍，并制出铜镍合金。后白铜经波斯（称为“中国石”）传入欧洲，受其影响，欧洲人直到公元1751年才提炼成功。^⑱可见我国汉代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具有很高的科技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镍和铜镍合金的发现是云南对世界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朱提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

3. 闻名全国的朱提银。《汉书·地理志》朱提县注：“山出银”，则至迟在西汉朱提地区就进行了银的开采和冶炼。王莽时改革币制，发行“银货二品”，据同书《食货志》载：此“银货二品”，即“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斤，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斤直千。”可见当时朱提地区银的产量一定很高，足敷全国通货之用，其质量也驰名全国，广为流布。后来“朱提”一词直接为白银的别称，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朱提银直到近代还有发现，1935年昭通刘家包包“梁堆”

出土银一块，重达2公斤以上，上刻铭文一行：“□年重五十斤”^⑨；另一传世品称“朱提银块”，方形，已裂成3块，上5字惟“提”、“银”二字依稀可辨。^⑩据推测，汉时的朱提银矿可能就是直到清初产银仍为全国之冠的鲁甸县乐马厂，其矿石一般含银24/10 000，最好的达94/10 000。^⑪要从这不到1%的含量中提炼出精银，决不是一般的技术水平所能办到的。到三国时，朱提银矿的开采和冶炼虽呈衰势，但威名尚存。诸葛亮书云：“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⑫仍将朱提银和汉嘉金相提并论。除铸造银币外，至迟从王莽时期起，朱提地区又利用自己丰富的铜矿资源，铸造钱币。传昭通发现过“大泉五十”钱范，背书“日利千万”，与其他地区发现的王莽钱范完全相同。^⑬

4. 儒学传播和孟孝琚碑。朱提地区交通沿线的大批汉族移民不仅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将内地汉族的社会文化完整地移植到了边疆地区，形成所谓的“南中大姓”。在大姓的产生过程中，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时朱提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诸家，应该说，他们推动了本区儒学文化的发展。朱提地区的儒学发展主要受到来自巴蜀的影响。还在西汉景帝末年，蜀守文翁就派人到京师“授业博士，或学律令。……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⑭开地方郡国设儒学的先例，推动了巴蜀儒学的迅速发展。川南的犍为郡很快成为儒学水平较高的地区，子弟多以儒学致用，并有位列三公者，后朱提太守多为犍为人士担任。朱提地区因位于犍为南部，也是一个设学的重点，其儒学水平远在滇池益州之上，著名的孟孝琚碑就是最好的证明。

孟孝琚碑（以下简称“汉碑”）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七月在昭通城东十里之白泥井出土，为现存云南最早的碑刻。碑身上截已缺，年号无征，高1.27米、广0.99米，文15行，行15字，隶书。文辞古茂，字画遒劲。此碑出土后引起